

铁 托 传

〔南〕弗拉吉米尔·杰吉耶尔著



铁 托 传

〔南〕弗拉吉米尔·杰吉耶尔著

叶周、敏仪、李潞、蔡声宁、周立方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者说明

本书作者弗拉吉米尔·杰吉耶尔为前南共中央委员、铁托的秘书，与铁托共事十四年，被称为“铁托的密友”。一九四七年以后，历任南共中央新闻部长、南政府情报部长和《战斗报》社长等职。一九五四年因支持德热拉斯被开除出党，撤销职务，并判处终身劳役。

本书是根据美国西门和舒斯特公司出版的英文本翻译的，初版于一九六三年，分上下两册。据该书英文本所载铁托给作者的一封信中说：他本人阅读了这部书的手稿，认为“事实准确，阐述鲜明”。

现利用原纸型重印，合订成一册，原来分为上下册的页码未作改动。

目 录

上 册

序 言	“涉及了严重的事情……”	1
第一 章	1900 年 “我的童年是艰苦的……”	10
第二 章	1912 年 “我学会了许多复杂的职业……发 表了反战的言论。”	26
第三 章	1923 年 “我被选为党的区委员会委员……”	46
第四 章	1925 年 “我决定进行绝食斗争……”	59
第五 章	1928 年 “我认为我只对我的共产党负责……”	73
第六 章	1934 年 “我不能再用我的真名字了……”	91
第七 章	1936 年 “对我在莫斯科所见的一切，我从 内心感到厌恶……我认为这是一 个暂时的内部问题。”	104
第八 章	1939 年 “由于我们的政治影响增长，我们 的地下工作变得容易起来……”	124
第九 章	1941 年 “不要沮丧，团结起来……”	138
第十 章	1941 年 “对苏联的进攻只是加速了我们斗 争的开始……”	154
第十一章	1942 年 “你们如果不能帮助我们，就不要 妨碍我们……”	176
第十二章	1942 年 “我们在没有任何外来的物质援助 的情况下战斗了二十个月……”	189

下 册

第十三章	1943年	“苏联人民和他们的军队承认我们的斗争——这是对我们最宝贵的承认……”	1
第十四章	1944年	“我平生第一次看到斯大林……”	15
第十五章	1945年	“对我们来说，现在最危险的事是半途而废……”	40
第十六章	1946年	“冲突的原因……是苏联对南斯拉夫咄咄逼人的趋势……”	52
第十七章	1946年	“他们企图在经济上剥削我们……”	67
第十八章	1947年	“我们伸出了友谊的手……”	87
第十九章	1948年	“但是现在……俄国人正在阻碍我们……”	104
第二十章	1948年	“我感到好像中了雷击……”	121
第二十一章	1948年	“只要我们不丧失勇气，我们必定会赢得胜利……”	143
第二十二章	1948年	“我们对斯大林开始丧失了信心，但没有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	167
第二十三章	1949年	“我们的革命不伤害它的孩子们……”	192
第二十四章	1952年	“我本是一个无知的青年，党吸收了我，教育我，使我成人……”	200
第二十五章	1952年	“我们面前仍有许多工作……”	217

序　　言

“涉及了严重的事情……”

我的书是写铁托和南斯拉夫的。我尽可能用铁托自己的話來叙說，因为他常常对我談起他在故乡的村子里渡过的青年时代，談起他流动于欧洲各个工場之間多年的工匠生活，談起他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保卫工人的权利而进行的斗争，談起絕食斗争，談起他在不同的监狱中渡过的許多年头。我又引用他的朋友和同他有往来的人們的話和引用文件来弥补不足。当然，我也把自己对事件的回忆写进去，因为我曾經是，現在仍然是铁托所領導的运动的成員。

我个人认识他已有十四年了。这些年代包括了对他的一生和事业最关重要的几个时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年，在卡拉盖奥吉耶維奇王朝的恐怖时期；当他为了迎接即将来临的决定性事件作准备而改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时候；在这种紧张的日子里，我了解他，因为他为了躲避警察的逼害常常在我家里住几天。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当他开始发动反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解放战争的岁月里我都是和他在一起的。

在那次战争中最危急的日子里，即一九四三年德国最高指挥部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要消灭我們的时候，我是同他在一起的。一項規模龐大的計劃已制訂好了，在五月中六个德国师、五个意大利师和一个保加利亚团包围了我們的主力。在我們方面，我們有三个

师，包括处于門的內哥罗和波斯尼亚边区的最高指揮部。那里是多山地区，被深深的山谷分割开。

战斗是剧烈的。德国人已占领了阵地，而我們要打出来，受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损失。铁托选择了从北面突圍。我們的突击部队冲破第一线，接着，敌人向受到威胁的地段增援。在我們这方面要取得成功，必須要在这个山区行动更加迅速。为此，铁托下令把所有的重武器都埋藏起来。饥饿是可怕的。我們吃掉了我們的馬。突圍的关键日子日益逼近了。

在一九四三年六月八日的傍晚，最高指揮部設立在米林克拉达山上，只带着一个二百人的警卫营。德国人的阵地只相隔两英里半。当我们接近他們的时候，德国人的山炮开火了。一发炮彈击中了我們队伍，打死了一个同志。夜降临了。我們在一座林子里移动。因为德国人离我們很近，我們不敢点灯。已开始下雨。我跟着莫薩·皮雅杰，他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在监狱中关了十四年，剛在战争爆发前被放出来。天色变成漆黑一团。有一次我們和队伍失却了联系。我們在树林里徘徊。我們不敢叫喊。德国人就近在眼前。我們躺在地上，試圖寻找出馬蹄在潮湿的草地和泥潭中留下的蹄痕，希望由此能找到我們的同志們。

那天晚上，最高指揮部的队伍分散了。铁托带了一个班到达了米林克拉达山的山顶。在清晨，德国人开始轰击我們的阵地。斯图卡式、亨格尔式甚至費斯萊·斯托区式侦察机也向山上俯冲。这座山約一又四分之一英里长，五百碼寬。

德国飞机来到的时候，我同莫薩·皮雅杰一起在山脚下。他們向移动的目标投下十公斤、二十公斤重的小型炸弹。一批又一批的飞机不断飞来，而德国的步兵正在向我們的阵地靠近。我們正等着铁托下山来。但是，他沒有来。我还在等着我的妻子奧尔加。她参加了游击队，是一个医生，帶領着第二师的医疗队。她和她的

单位也在山顶上和铁托在一起。

约在中午的时候，一个通讯员给我们送来了一封信。

“铁托受伤了……德国人在前进。立即派警卫营前来。”

我们从山谷里向山上走去。突然，一个头发蓬松、满脸通红的姑娘从树林里喊道：

“弗拉多同志，奥尔加正在叫你把她带出来。她受了重伤。”

她是奥尔加单位里的一个护士，叫露斯加。她三言两语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我。一颗炸弹击中她们，奥尔加的肩炸开了。

我赶忙上山。伤员们正在成群地沿着山坡走下来。轰炸机重新又出现了。斯图卡式飞机几乎擦着高大的槲树顶俯冲下来，投着重磅炸弹。露斯加、一名波斯尼亚战士和我在第一颗炸弹爆炸时就趴倒了。炸药的恶味使我们感到窒息，白天变成了黑夜。当浓烟略散了一点的时候，我看到那个有着黑色的大眼睛的波斯尼亚青年躺在我的身旁。他的两只腿都被炸断了，血正在涌出来，带着从树枝上被炸下来的绿色的槲树叶一起流走。我们对他无能为力。他快要死了。他向我打着招呼，轻轻地说道：“斯大林万岁！”

我又往山上赶去。在山上二十码的地方，奥尔加坐在一棵橡树底下。她的肩上缠满了绷带，血透过绷带流出来。她用她的深黑色眼睛望着我，想要对我笑一下。

“不要怕，不过伤是重的。”

一个通讯员走来说，德国人的一切进攻都已被击退；铁托正在下山。我在山谷里找到了他。他的臂上缠着绷带。当我正在用匙喂奥尔加喝汤时，他走到奥尔加和我的身旁，问道：

“奥尔加，你怎么样？你受了重伤吗？”

天渐渐地黑下来了。我们的队伍重新列队前进。奥尔加骑在马上，我扶着她坐稳。手榴弹在爆炸着。在愈来愈深的黑夜里，德国机枪在响着。敌人在战线上投入了增援部队。战斗不断地进

行了九昼夜。敌人的营和我們的一些部队混在一起了，使得德国人有时也向着自己人开火。我們终于突圍了，但是我們军队的精华在战场上遭到了损失。伤員多得数不清，沒有时间进行手术。铁托也只缠了一次绷带。一天晚上，我发现他在口述一封向莫斯科报告这次战斗經過的无线电报，他发着燒，躺在一棵树旁。不停的战斗使我妻子的手术也不能进行。她忍受了九天，有时骑着馬，有时步行，天还下着大雨。在第九天伤口出現了坏疽症。不得不在一間小屋替她进行紧急手术。她的一只手臂被锯掉了。在手术过程中，德国的子弹不时射中木屋的板壁。

她在恢复了知觉后說：

“不要担心。我不能再担任外科医生了，可是我还可以做儿科大夫。”

四个同志用担架把她抬到师部。我剛走进师部不久，机关枪和迫击炮又开了火。我赶忙跑近奥尔加躺着的地方，突然，我感到一下可怕的打击。我被抛到空中，然后又跌到一条小溪中。我沿着山谷往下滚，后来却怎么样也找不到我妻子的下落。那四位同志抬着她走进一所磨房，她就在那里躺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我們又遇見了。我头上的伤口正在出血，我还在發燒。我們正在爬罗曼尼亞山。奥尔加的一位朋友是大夫，要替她打一針止痛剂。

“斯大諾热卡，不要浪费掉这种珍貴的药，”奥尔加說，“留着救别的同志用吧！”

他們把担架放下来休息一下。奥尔加对我說：

“好好照顾米丽卡。照料她好好地长大起来，让她成为一个軍医……”

几分钟后，她吸了最后的一口气。天很黑，風颼颼地吹过那些高大的杉树。我們沒有铁罐，用刀子和光手替奥尔加挖了个坟；德

国人已进入山下的村子，否则我們可以从那里借到铁鎌的。

游击战士拉查是一名矿工，用手挖着坟土。

他說：“弗拉多，我們已挖到岩石了。”

我們把我的妻子放在那淺淺的墓穴里，用草皮把她盖起来，然后再用石块做了一个坟丘。我們脫下了帽子，放了四枪向死者致敬。游击战士拉查喊道：“她将永远活在我們的記憶中。”

然后，我們就出发穿过黑暗的森林，去追趕部队。

这是一九四三年六月的事。我暫時停止回忆，让它跳过四年半的时间，跳过这场战争的最后年月，跳过胜利带来的凱旋和忧虑，跳过为南斯拉夫取得独立的权利、按它自己的願望发展的权利而进行斗争的初期阶段。現在我来追述一九四八年二月中旬一个重要的日子。

已經决定我要到加尔各答去，作为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代表去参加印度共产党第二届代表大会。离开动身还有两天，我正在为这次长途旅行进行准备的时候，我的電話响了，铁托的秘书問我当天晚上是否有空，铁托想同我談談关于这次旅行的事。

我慢慢地走向魯蒙斯卡大街十五号。大門的警卫放我通行，我踏着这条通向铁托別墅的弯弯曲曲的熟悉的小路。这条路約长三十多碼，通过一座大花园，两旁种着些低矮但很粗壮的树，树枝互相交叉而形成一座华盖。对我來說，每次穿过这条后面有爬滿了藤蔓的墙的小路，是一件愉快的事。

我进去的时候，铁托正在书桌上工作；他正在閱讀一份報告，他抬起头，向我做了个手勢，要我走到书房的另外一边。他看来有点疲倦。这使我感到惊讶，因为他一般很少露出疲倦的神情。

铁托点着了一根香烟，并按他的习惯把烟塞到一支像烟斗似的鑲銀的烟嘴里。他吸着烟，交叉着两条腿。这时我期待着我們会开始談起我的旅行了。他看来好像要同人談一件复杂的事情，

而希望听到他的反应。我很熟悉他的这种姿态。

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尽管在那个时候我认识铁托已有整整十年，而且经常和他有接触，我仍然猜不到他要对我说些什么。我本来以为他要同我谈关于这次旅行的事，他的话题同我的期望完全无关，使我大吃了一惊。他说：“你知道在罗马尼亚发生的事情了吗？他们下令把我的像片全都拿走！你从外国通讯社的报道中一定知道了这件事，是吗？”

他严肃的语调使我吃惊。我看到这些报道，可是我认为这些都是无稽之谈。

我每次同铁托谈话都感到尴尬，因为我很少能用自己经过思考的答案来回答他的问题，而仅仅把随口而出的话说出来。所以从我的嘴里说出了这些话：“这是怎么一回事？难道这不是通常的造谣吗？”

他突然显出烦恼之感。只是在这个时候我才仔细地看了他一眼，看出了他的脸色已经变了。他的脸色显得阴沉，深深地充满了忧虑。他的浮肿的眼皮说明他没有睡觉。

我立即清楚了，我走进书房时得到的第一个印象并没有错。铁托是疲倦了，非常的疲倦了。我马上懂得，严重的事情发生了，有困难的事情在内心困扰着他，使他在脸上流露出这种可以看出的痕迹。

铁托心神不安地又交叉着他的腿，吸了一大口烟。他好像没有听见我提出的混乱的问题，接着说下去：“你是个幸运的人。你一点都不知道呢。战争的日子，第五次进攻的时候，我们四面八方被德国人包围起来的日子是美好的日子。当时我们知道，我们只有依靠自己来保卫自己，而我们也尽力打出来了。可是，现在……当一切条件都对我们有利的时候，俄国人却在拖我们的后腿。”

我哑口无言。思想像闪电一般在脑海中閃来閃去，冲击着，几乎使我在肉体上也感到痛苦。我想起了几天前同新来的苏联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驻贝尔格莱德的代表加里宁的一次谈话。他告诉我南斯拉夫并不爱苏联，很少人读俄文，学校里教英、法文的课程比俄文多，在保加利亚的情况则完全不同，那里的保苏友协几乎有一百万会员。我没有认真地对待加里宁的话。因为我没有想到这个小小的苏联职员也会教训起南斯拉夫来。我笑着对他讲：“保加利亚的情况是很容易理解的。在决定生死存亡的战争中他们没有表现出喜欢苏联，现在他们想弥补一下。”

可是，从铁托对我讲的话看来，这个刚从莫斯科来的卖力的职员竟是按照他的上司的指示在说话呢。我记得他吹嘘说，他是日丹诺夫亲自把他派到南斯拉夫来的。我把所有这一切同铁托这时对我讲的话联系起来，就想到这不是偶然的。这意味着同苏联发生冲突，同斯大林发生冲突。不过，这肯定是不可能的！一定有了误会。在这个国家里有谁不爱苏联呢？怎么可能我们会同斯大林吵架呢？这正如同有人说我们自己吵架一样。所有这些想法都在我脑中转着。

铁托注意到他的话在我身上所产生的影响。我逐渐理解了他脸上的皱纹和他的倦色所具有的重大的含义。正在等待着作出重大的决定，恐怕是对我们今后的历史命运最紧要的决定。这不仅是涉及个别人的事情，而是涉及南斯拉夫的将来，涉及它的全体人民。这个国家一旦同苏联破裂，会产生什么后果呢？我们的全部外交政策，一切的一切都是同苏联有联系的。我们所有的经济计划，我们所有的资本货物协议都是同苏联签订的。如果我们同他们分裂了，我们会怎么样呢？铁托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路。

“我们等着看下一步将会发生什么事，”他说道。“卡德尔，德热拉斯和巴卡里奇都在莫斯科。”

“难道他們不是去討論軍事援助和我們工业所需要的装备嗎?”

“不,不仅如此。涉及到严重得多的事情。我們盼望他們很快就可以回來了。”

这就是全部經過情况。接着我們討論了关于印度的問題，然后我就离开了。

現在我才知道，那一天铁托正在作决定。在他面前摆着两条路，他只能选择其中的一条。他曾經同斯大林在一起作战，向斯大林要求支援，苏联曾經是他的灯塔。他臉上的皺紋說明他內心的痛苦。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到印度去，从印度回来，我也遇到了同样的抉擇。不久，每一个南斯拉夫人都遇到了这个問題。这是要作出的最重大的决定。这个决定作出了。这不仅意味着南斯拉夫保持独立的权利，这也意味着，所有的人民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道路走向进步。这使得斯大林勃然大怒。他心中的憤怒，他对南斯拉夫的憎恨是昭然若揭的。铁托是斯大林的良心，是斯大林已經失去了的良心。

在这个重大的斗争过程中，南斯拉夫成了世界注意的中心。人們不断地写出关于南斯拉夫和铁托的书，有些是真实的，有些是虛构的，有些是好意的，有些是不帶好意的。

我认为，一个南斯拉夫人从南斯拉夫人的观点來向全世界輿論介紹铁托是唯一正确的事。我并不认为这是一本铁托的傳記定本，而仅仅作为他的傳記的一种貢獻。五十年或一百年后，一切事情都会以原来的面目出現，卑鄙的事情也会显出原形，历史不是依据人們的願望而是依据事物的真相作出裁判。那时，下一代的人来写關於我們的时代，以及介紹在我們的时代里生活的人們的时候，我希望他能从这本书里找到關於南斯拉夫和它的人民，更重要的

是关于铁托的某些有价值的材料。

我的願望是要按照铁托的本来面目来介紹他。写出他同普通人一样有人类的欲望和情感。作为一个具有在某些方面特殊发展的性格的普通人来介紹他。他通过他的这种特殊性格正在起着他今天所起的作用。

有些人会說，我这本傳記带有偏見，是感情用事的，是带有憎恨和喜爱的。我并不否认这一点。我爱我的国家，我爱铁托。我提出了我們的观点。我按照我們的观点来記載事物。我相信，让人们有机会听到和知道小小的南斯拉夫的人民的看法是正确的。恐怕再也沒有任何别的同南斯拉夫同样大小的国家受到过这样巨大的压力。

第一章

一九〇〇年

“我的童年是艰苦的……”

一九四二年的夏天，游击队在多岩石的內哥罗群山里苦战两个月之后，开始了通过意大利人和德国人占领的地区向西部波斯尼亚作长达一百八十五英里的远征。

我們在黃昏时到达采倫科拉山脚下。大地的景色突然改观。光禿禿的岩山不見了，我們走过的是一片片的水仙丛和槲树林。游击战士很少有机会去观赏他所走过的乡間的自然景色。可是，这里的改变是如此地突然，景色是如此地吸引人，我們也开始談論起新的自然环境来。铁托騎的馬疲乏地慢步走着。铁托說道：

“这一片植物意味着生命。我們所走过的岩石地带給我們留下了死亡的印象。这里使我想起了我的故乡扎果烈。”

我們在一块开闊的空地上停下来，搭帳篷，用槲树枝生起篝火。槲树是游击队員最宝贵的燃料，因为它能发出最强烈的火力。每人在晚饭时分到一磅肉。我們把它切成小块，加上盐和附近长出来的大蒜，然后把肉串成一串在火上烤来吃。接着大家就唱起歌来。

我們听到远远地傳来好像微風吹树枝般地微弱的机关枪响声。我們把馬拴在离火不远的地方，它們吃着草，不时不安地嘶叫

着，竖起耳朵，好像害怕有狼似的。有人把一根粗壮的树干投入火中，火光照亮了铁托的脸。他的五官是周正的，他有着高高的额头，微翘的下巴和壮健的两颊，使他看来给人一种敏锐和坚强的印象。而他的眼睛和微笑又给人一种和蔼之感。当我的朋友问我关于铁托的外貌的时候，这两种经常交替出现的特点使我很难回答。

火慢慢地灭了，歌声也随着慢慢地消失了。铁托开始对我们讲起同我们正走过的这个地区很相近的他的故乡扎果烈：

一八九二年五月，我出生在克罗地亚地方的一个名叫库姆罗维茨的村子里。这个村子属于扎果烈（“山后之乡”）区。我的名字叫约瑟夫·布罗兹。这里位于南斯拉夫六个共和国之一的克罗地亚的西北部。我的村子在一座美丽的山谷里，山谷两旁是复盖着树林的山头。苏特拉河弯弯曲曲地流过这里，流过那些本地人用土制的瓦或长着青苔的木板屋頂盖起来的青蓝色的小屋。

只要你抬头望望扎果烈地区的山坡，你就可以看到那些古老的堡垒、城堡或是教堂的高墙。这些是罗马时代的历史遗迹，那是充满了战争和压迫的时代。在库姆罗维茨的一座山上，耸立着像巨人般的切萨尔格勒，这座属于埃尔多迪伯爵家族的中世纪城堡只留下了断瓦残垣。直到上个世纪中叶克罗地亚正式废除封建制度之前，他们一直是我们的村子以及周围乡村的领主。他们是残暴的，而他们的农奴也常常起来反抗。

一五七三年一个冬天的早晨，切萨尔格勒的农奴们戴着象征反叛的鸡毛冲进了城堡，杀了总管家，烧毁了一部分城堡，缴获了几门炮和好几枝步枪。起义者的领袖是马蒂亚·古贝奇，而起义者的主力军是由伊利亚·格雷戈里奇率领的。他在切萨尔格勒渡过了苏特拉河，鼓动斯洛文尼亚的农奴起来武装暴动。起义发展

到整个扎果烈地区和斯洛文尼亚的部分地区。参加的人有数万。但是，由克罗地亚的总督兼萨格勒布的主教尤拉热·德拉斯科维奇率领的贵族军队是骑兵，兵力更强。衣衫褴褛的农奴受到严寒的折磨。格雷戈里奇退到我家乡附近的扎果烈，在圣彼得和库姆罗维茨之间、切萨尔格勒以南的地方渡过苏特拉河的时候打了败仗。第二天，在多尼亚·斯图比察*附近，由马蒂亚·古贝奇率领的当地的农奴起义军的主力进行了决战，古贝奇被捕了。总督兼主教德拉斯科维奇写信向奥地利皇帝马克西米利安报告说：

“如蒙神圣的皇帝陛下俯允，我将把一顶烧红的铁冠加于古贝奇之头，以警余众。”

他的确这样做了。伊利亚·格雷戈里奇被俘后送到维也纳受审问。一年后，他被送回到埃尔多迪的手中，被砍了头。

扎果烈的农奴受到了严厉的惩罚。历史学者说，在各个村子的树上吊着成百具农奴的尸体。据估计，在这次起义中，仅扎果烈一地就有四千到六千名农奴遭到杀害。芭芭拉·埃尔多迪男爵夫人在她的城堡遭到进攻时逃脱了，她对切萨尔格勒的农奴尤其残忍。三个世纪以后，我们在童年时代半夜里醒来的时候，我们的母亲就会吓唬我们说，不马上睡着，切萨尔格勒的黑皇后就要把我们带走。

我的祖先很可能参加了这次著名的起义，因为他们在十六世纪时，为了逃避土耳其入侵者的屠杀，从达尔马提亚迁移到库姆罗维茨，成为埃尔多迪的农奴。在他们的后代中，每一代总至少有一个人是做铁匠的，因此这个家族就被人叫做“科凡奇”，意即铁匠。这个传统以后对我选职业也产生了影响。

我的祖先是实行宗族群居的。土地由集体耕种，全宗族由选

* 在铁托贝尔格莱德的书房里，有一幅克罗地亚画家克罗斯托·希奇图西奇画的关于多尼亚·斯图比察战役的画。这幅画有六码宽。